

解放战争我军为什么总能打胜仗

解放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自然有密切的关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解放军的战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陈毅披露的战术问题

在战争初期,一些干部战士不太注意提高战术水平。1947年底,陈毅离开华东战场前往中共中央开会,在途经晋冀鲁豫、晋察冀和晋绥等地时,应这些地区所在的中央局或军区的邀请,陈毅介绍了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有关情况。在讲到华东野战军的战术问题时,陈毅说:“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直到现在,我们仍保持北伐时期的战术,采用波浪式的集体冲锋。”“由于我军多是翻身农民,他们参军没几天,就拿枪打仗,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因天天要打仗,没有时间训练,步兵战术、战斗动作、内务条令我们都没有研究,更谈不到按步兵操典上所说的去做,甚至连军语也不懂,作报告就是一套‘精神训话’,什么‘英勇杀敌,打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等’。如果我军能把战术战斗动作提高一步,就可以减少伤亡……这要引起我们领导上很大的重视。”

陈毅还讲到一个情况:某部有一个营长指挥三个连去打一个村里的敌人,村外是开阔地,这个营长不讲究机炮火力掩护,敌人等到

解放军冲到七八十米远才打枪,冲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一个俘虏兵是轻机关枪射手,他看见营长叫“打!打!打!”就说:“营长你叫打哪里呀?”营长没法回答他。俘虏兵说:“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营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这个俘虏兵并提出要用三挺机枪封锁五个枪眼,他先负责布置,搞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齐开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营长就发命令冲锋,以手榴弹打进去,没有一个伤亡,敌人就被迫投降了。

“提高战术,减少伤亡”

正因为如此,各野战军都十分注重部队战术水平的提高。徐向前就曾对一些干部不讲战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亡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一个指挥员必须懂得,人是最宝贵的。从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是很不容易的。长成一个人,长成到当兵的年龄,需要十八到二十年,人死去是不能复活的。因此,我们要爱护士兵,爱惜士兵。一个新兵如果不加训练就拉上火线,那是送死战术。不讲战术叫士兵去乱冲,也是送死战术。一个指挥员随便叫下级和士兵去送死,那是罪恶。打仗是必须牺牲人的,但不能做无谓牺牲。懂得了这条,自然就要加强对部队的训练和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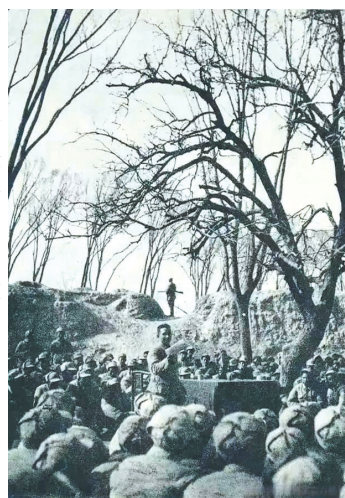
陈毅也说:“我们有个

神圣责任,就是要提高战术,减少伤亡,这样我们才是对人民负责任。”

朱德更是号召全军努力提高战术水平,明确提出“勇敢加技术,就是很好的战术”,要求全军认真研究战术问题,不但要提高自身的战术水平,而且要进一步研究敌人的战术,“不要以为敌人快要死亡,它在战术上就一点变化也没有。它吃了许多亏,逼得它也要有些变化。我们就要经常研究敌人的战术,研究如何打它,如何避开它的长处专找它的弱点打,如何才能干干净净地歼灭它”。

战术技术快速提高

经过高级指挥员对战术问题的强调和战争的积累,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实践中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例如,东北野战军就形成了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猛、三三制等战术。一点两面中的“一点”,就是要选择敌人一个最薄弱点,将主要的兵力集中使用于这一点上;“两面”就是要有两面以上的攻击部队,尽可能两面(包括主攻的一面)或三面、四面围攻,这样才能保证全歼敌人。所谓“四快一慢”是指向敌前进要快,攻击准备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总攻击一定要在准备好了的情况下才发起,如果尚未准备就绪,则宁可慢一些。“三猛”,即猛



粟裕在淮海前线给干部作战前动员。

打、猛冲、猛追。三三制战术就如一个班编成三(四)个战斗小组,每组三(四)人,以便于班长指挥、小组灵活机动、各组互相支援。

1948年六七月进行的晋中战役之后,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前委及时认真总结了晋中战役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十条具体的战术原则,即“充分准备,精心计划;进攻防御,都要精通;军事民主,服从命令;坚决顽强,果敢勇猛;隐蔽突然,敏捷机动;主要方向,力量集中;插入切断,连续进攻;发挥爆破,步炮协同;互相援助,一致行动;全歼敌人,建立战功”。人民解放军通过整训练兵,使战术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聿明承认,“解放军的战术技术及战斗意志远远优于蒋军”。 罗平汉

志愿军成功化解美军登陆计划

1952年8月3日深夜,一架美机飞到位于朝鲜东部的万年德山地区上空,从机舱里向下飘出了三张降落伞。降落过程十分顺利,可三个特务刚刚落到地面,就被志愿军战士抓获,带到志愿军第九兵团驻地,由保卫部部长丁公量提审。

面对为何会在这里降落的问题,俘虏们始终避而不答。就在这时,看守战士发现一个叫孙东春的特务的胸口有东西在动,便上前从他的衣服里取出一个盒子,盒子上有几个用来透气的小眼,原来盒子里面是一只鸽子。丁公量敏锐地判断出,这是一只用来专门传递情报的信



第九兵团某部在前进。

鸽,它脚上携带的金属小筒就是用来装情报的。见此,丁公量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对付美军情报机构的计策。

丁公量命令孙东春将一封密信放进小筒并放飞信鸽,向敌特务总部“报平安”。两个月后,鸽子带着情报飞了回来,“10月6日

晚,莹德山接客”。就此,一张天罗地网在莹德山展开,等着敌人自投罗网。

不出所料,10月6日晚,第九兵团第二十三军在莹德山地区成功捕获韩国籍特务四名(情报员三人、报务员一人),缴获大小收发报机两台、密码密规全套等。经审讯得知,这批特务的任务是查探东海沿岸的中朝军队驻防情况。这些重要情报很快上报给志愿军总部,志愿军总部经过分析,判断美军极有可能是因为陆战不敌志愿军,就打从海上进攻朝鲜人民军的主意,实施所谓二次“仁川登陆”;如果美军计划得逞,成功在朝鲜东海岸登陆,“三八

线”以南的志愿军就会非常被动。而眼下能化解此次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向美军传递假消息,来干扰美军登陆计划。经过志愿军总部批准后,丁公量逆用敌特电台,利用缴获的发报机向美军接连发送“情报”,让美军误认为志愿军已有准备,很快将会与朝鲜人民军共同防守东海岸。

这一招效果十分显著,美军收到“情报”后果然没有轻举妄动,而朝鲜人民军则趁此机会在东部沿海地区构筑起了更加牢固的防御工事,等到美军再次决定实施登陆作战时,早已错失了战机。

刘军玉

为何唐代文人多任“刺史”

翻看唐代大文学家们的履历表,你会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有过担任刺史的经历,比如张说、张九龄、岑参、高适、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杜牧等。不少文学家在后世以刺史代称,比如岑参世称“岑嘉州”,韦应物世称“韦苏州”,柳宗元世称“柳柳州”。还有一些诗人的诗文集也以刺史命名,如岑参的《岑嘉州集》和韦应物的《韦刺史诗集》。

刺史,全称“使持节某州军事某州刺史”,为唐代州级行政单位的最高长官。整个唐代的刺史人数超过两万人。刺史的品级与州郡的地位相联系,唐代的州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八级,刺史的品级随之有高低之分,大多在从四品到正三品之间。

除了初唐时期政权初定,刺史多是武人之外,后大多由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知识分子担任。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唐代苏州的经济、文化地位重要,有“吴郡,自古皆名人为守”“苏州刺史例能诗”之称。据《唐刺史考全编》的考证,担任过苏州刺史的官员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包括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这样的大文豪。

对于文人来说,担任地方刺史,一方面可以远离朝堂上的纷争,另一方面,作为州郡最高长官,也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地方文化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刺史在唐前期和中期地位较高,唐朝中叶以后,刺史则大多成为朝廷被贬官员的归宿。大唐文坛著名的“铁三角”都有被贬刺史的经历——韩愈原任刑部侍郎,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刘禹锡,曾被贬为连州刺史;监察御史柳宗元,曾被贬为邵州刺史。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加强,地方的各种权力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导致州郡地位的下降,不少节度使甚至自行任命辖区内的刺史。刺史仅能管理一些行政事务,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刺史,地位更低,一般官员都不愿意去,因此调任这类刺史就带有惩罚的性质。更甚者,如著名的“八司马”,担任刺史的助理,其地位之低,可想而知。陈品